

文化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误读”问题反思

周媛¹ 林克勤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国际传媒学院, 重庆 401120;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话语”误读是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接触的特殊方式。在中西方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语言交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意识形态等存在的差异造成了话语“误读”。话语“误读”中的善意、创造性叛逆等因素与效用不必过分夸大,但恶意误读值得高度重视。我们应该在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共生的视角下去看待跨文化传播话语误读存在与合理性,应该在平衡异质文化现象关系的过程中,试着去找出跨文化传播中正确应对善意“误读”与“恶意”误读的策略与途径。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跨文化传播;话语“误读”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6-0085-06

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他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提出“跨文化传播”。此后的60年时间,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影响成为可能,全球化成了一个描述世界当下状态和基本特征的热词。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往活动,在各国未来的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中所遭遇的“话语”误读正引发着多元性的文化冲突与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潮流。

1 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误读

跨文化传播离不开全球化的推波助澜,谈及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误读,首先,就要解释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全球化。李希光等(2000:3)对“全球化”作了如下解释:“所谓全球化,从目前来看,是属于支配地位民族(美利坚民族)的文化,是美国单向传播的全球大众文化。美利坚化的文化是中心文化,非美利坚文化是边缘文化。”由此可见,作为经济、政治全球化的伴生物和跟随者,从某种程度上,文化全球化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和自大型思维方式,形成了文化霸权,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以及消费主义的追捧式盛行和炫耀性蔓延更加剧了西方文化的同质化驱动与广泛性扩展,也使得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话语”误读出现了多样性,这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新的考量。我们既要清楚认识西方国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和引导作用,又要对边缘国家的地位和处境有准确的把握;既要坚守自己的精神价值中枢,抵制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又要跳出狭隘民族主义的限制,积极吸收西方思想和话语文明中的先进养分。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话语“误读”已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经常遇到和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一般来说,话语“误读”指的是按照自身母文化的传统记忆、思维路径、语言方式、实践体认等先验传承和后天培养的言语行为向度去解读另一种异质文化,从而形成与他文化立场不相一致的理解与行为

收稿日期:2020-07-15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校级科研创新团队“中国文化外译与传播科研创新团队”(CXTDN202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媛,女,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国际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媒体营销与文化传播研究。

林克勤,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策略与路径、文化话语体系和体认传播学研究。

效果。从传播学视阈来看,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话语体系的传播行为,因此话语“误读”可以从人类传播角度寻找原因。这体现在:(1)人际交往中其他人的思维(态度、思想和情感)处于隐秘状态很难被我们真实探知;(2)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缺损难以准确反映客观事实及其他人的态度和意见;(3)我们经常使用的编码系统(如语言、姿势)的缺陷使得真实解读我们收到的信息难度加大;(4)由于不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使得我们对他人行为的认知可能是有偏见的;(5)我们对自己认知能力的自信与客观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上述这些情况在言语不通、心理隔阂、价值分歧等情况下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不会随之削弱(吴莉苇,2006)。

中国与西方的跨文化传播既有诗学理论上善意的文本误读,也有意识形态影响下恶意的“话语”误读。“话语”误读产生的原因可以总结为语言交流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行为方式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不同语言的人们在交流时明显会受到语言的束缚,受制于这种典型化的沟通障碍,人们很难通过语言这种交往介质去透彻了解对方的习惯、偏好和禁忌等问题。如果通过翻译,又会遇到话语转换的不确定和不充分性问题,这使得一些信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或被扭曲。语言还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巨大的影响,较高层次的思维依赖于语言这一假设得到了大量的科学支持,语言可以被看作是外在化的思维。大多数人独自冥想时,头脑中常会出现一些日常生活的视觉画面。一个人受教育越多,文化水平越高,他的内心思维和冥想型构就会变得越复杂越精细。一般情况下,独自冥想时大多数人都会自言自语或自己说服自己。毫无疑问,无论是说出声来还是不说出声来,言语都等同于一种行为方式(刘易斯,2002:11-12)。

在不同文化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与西方的行为方式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中国人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自我,而西方人是在个体的前提下认识自己。由于在个体的层面上认识自我,自我就是权利、义务、尊严、心理、生理等诸要素的实体;由于在关系的维度上把握自我,自我就是各种关系、各种角色的间性复合。”(樊浩,2001:4)因此,现实中的中国人守纪律、重规则、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强调个人、他人、集体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西方人则以存在的个体为中心,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奋斗精神,主张通过个人的不懈追求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本质差别,西方社会对中国抱有天生的成见和不信任感,总企图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塑造成它们设定中的那个东方伙伴。在西方人的核心想象中,只有与他们一样归属于同一话语系统,遵循同样的价值,讲述相似的故事,践行其主导的规范,中国才值得信任。

2 “话语”误读的诗学功能

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误读、善意的误读和创造性的误读,这种“误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曲解、叛逆、偏离”,而是阐释者的有意改编是一种跨文化传播中常用的诗学手段。例如,布鲁姆诗学影响理论的一个关键术语就是“误读”。布鲁姆(Bloom,1973:7)强调,在研究诗学影响或误读发生时,一定要把作者的个人秉性和倾向性选择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进去。这就是说,当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发生时,往往是由于交流者根据各自的母语文化背景、传统知识结构和个人好恶来进行有重点的阅读、根植于立场的理解和必然的倾向性认知(乐黛云,1995:110)。

在现代解释学看来,人们在进入理解活动之前就存在着某种思维的“前见”,而这种前见正是来源于理解者的历史记忆和普遍经验。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世界不是作为简单和实在的东西向我们呈现的,它是围绕着人类社会的一个待建构和阐释的存在,世界与人的互动对视使理解成为可能,这种对世界图景的建构与认知扩展开来就形成了解释。其二,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里的,在人类开始思考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对事物的解释并不是从空白开始的。人的世界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型、体认方式、审美情趣等就会成为他在理解某个事物之前就拥有的东西。于是,人在对事

物的体验和认知加工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视界(看问题的立场和区域),而这视界就会影响认知主体对事物解释的方式、角度和观点,人的前见和先验也由此产生。有前见和先验在,文化交流中“话语”误读的可能性就在所难免(谢华,2006)。伽达默尔更明确地把这种前见称为“偏见”,他指出:“偏见不一定是不正确的或扭曲的,并非对存在和真理的有意叛逆。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场合中包含着的这种前见或偏见,为人类文明生命体整个经验的构成定位了最初的方向性,也引导了建构事实和传播意义的倾向性。”(伽达默尔,1994:9)

另外,在跨文化传播中,传输文本中的空隙或者说裂缝天生存在,因为没有文本可以涵盖一切事实和真相。这些缝隙在解读参与创作和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因为差异化的信息和多样化的阐释会从不同角度把它们填满。基于这个原因,一个文本可能有多种意义的延伸,而且没有一种阐释可以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单一个体的读者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填充这些缝隙,从而排斥其他立场和视角的可能性。这些被放弃的每一种可能性都是一种合理的诠释,一种别样的解意,因此说,一个文本的意思因人而异。这些缝隙正是作者留给读者的认知空间,作者邀请读者积极参与解读、发挥想像力、构建新文本(张龙海,2010)。如唐朝诗人张继的不朽名诗《枫桥夜泊》在国内外竟有40篇不同的译文,各国译者都在认真体验原作者表达在原诗中的各种意义指向,去填补这短短四句诗的文本中的各种缝隙。如把“乌啼”翻译成“乌鸦的啼叫”“乌啼桥”,把“江枫”翻译成“江边的枫树”“江村桥与枫桥”,把“渔火”翻译成“渔船上的灯光”“打鱼的灯火”“打鱼人的灯火”,对“船”与“山”或用拼音,或直译,把“霜满天”译成“下霜”或“地上的霜”,把“客船”译成“慢悠悠的船”“旅行者之船”“流浪的船”等等。在兰盖克的识解观视野里,这些差异化的解读都凸显了文本阐释的主观性,从定位不同的辖域、选择差异的视角、凸显兴趣的焦点、权衡具体而微的精细度来观察事态和解释场景,呈现了译者们对张继描述的场景和境界不同的体验力和解释力(王寅,2008)。

从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看,人们对语言多义性的理解也使跨文化传播中善意的文本误读成为常态。在对语言的认知过程中,人们的思维发展经历了一个多层面的梳理过程。在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人们将语言当成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认为语言具有忠实可靠性,受到人类的绝对主宰,并认为人们通过语言能再现客观世界。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则发现,语言再现人类情感时往往词不达意,使人们对语言再现客观世界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到了20世纪,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指出,在虚无的世界中,语言具有先在性,人类无法摆脱语言系统对思维的束缚,从认识世界的主体变成了语言规制下的奴隶(冯寿农,2001:3-4)。后结构主义从语义习得的角度进一步指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不确定性,所指总是“缺席”或不在场,使得意思在散播的过程中出现延异、代替,这就使得意义无法确定。也就是说,一个词在语用的过程中不会仅仅只呈现给人们一个稳定的意思,有可能指鹿为马,也可能言此及彼。同理,交流的文本在指向的过程中也无法确定一个稳定而唯一的意义,完全可能被交流者读出多元而不同的价值内涵。因此,语言体系不再是被动地受人支配,而是摆脱了表征工具的束缚,语言也解除了忠实地充当人与世界的互动交流中介的枷锁,不再是一面自然透明之镜,而是意义多样化、指向不确定的哲学之镜。由此推论,文化交流中存在的许多缝隙和盲点,经过人们的善意误读和差异化思考、多样化理解,就有可能变成真知灼见(张龙海,2010)。

如果在异质文化的相互接触中建立某种确证的、有机的联系时,这种文化误读就可能有助于文化创新,尤其是当作为传播媒介的个人或群体有意利用产生文化误读的心理机制和传播体系以达成某种社会效果时(吴莉苇,2006)。因此,对于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误读、善意的误读和创造性的误读,须保持正常心态,这种误读可以理解为跨文化传播中的背离、叛逆与重塑,是解读者为达到某种主观愿望而对异质文化进行的创造性接受与归化改编。

3 西方对中国“话语”误读的伎俩与意图

在错综复杂的文化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往往已经超越了文化层面的平等交往,而是与经济、政

治、科技等因素相关,一些国家已经把对外输出文化变成了主要对外产业之一,甚至看成是自己对他国进行思想控制和洗脑的工具,从而不可避免地在传播中形成了恶意的“话语”误读,而且在当前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恶意误读是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身所熟悉的一切出发对中国进行各种解读,集中形成的关于中国的诸多错误想象和不当言说。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让七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量大幅增加,在多边国际组织、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在经济、社会、人权、环境保护、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领域不断取得进步。当然,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在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平衡的问题。然而,西方罔顾中国的现实和国情,刻意夸大中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肆意歪曲、恶意丑化和防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

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恶意误读是多元化的,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第一,在政治上恶意“误读”中国模式。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形成了中国模式。然而,不少西方学者却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以2020年的新冠疫情防控为例,在与来势汹汹的疫情抗争中,中国的社会制度优势、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人民团结一心、行动一致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中国尽最大努力援助他国或地区抗疫,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但是,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却依然忙于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美国国务院甚至下发文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与特朗普“统一口径”,对中国发起“舆论战”,污蔑中国,栽赃中国。第二,在经济上一方面继续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一方面唱衰中国经济,宣扬“中国崩溃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强国战略”等充斥西方媒体。有人认为中国比欧美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更有效,中国将取而代之。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而持有“中国崩溃论”的人不顾中国的发展进步,极力唱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制造相关舆论,目的就是使中国经济受到打压和创伤,以便从中牟利。第三,误解和歪曲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文化理念上存在问题,中国人总是愿意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工作,本质是为了金钱和利益;为了金钱和利益,他们可以牺牲家人、喜好甚至身体健康。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专制、权威和封闭为特征的,万里长城就是这种文化的象征,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专制权威与百姓的幼稚精神,另一方面让人想到了中国的与世隔绝和停滞僵化。“关于中国的家长式专制的观点,不约而同地发现长城以及修建长城在这方面的典型的象征意义,它提醒人们想象与认识中华帝国的封闭无知、停滞衰落,中华帝国像埃及、印度那些东方专制帝国那样,像驱使奴隶那样驱使在精神上还处于孩童般蒙昧状态的臣民。”(周宁,2002)最后,在军事上,不少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在试图一步步改变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近期,中美战略对立态势凸显,美国在南中国海军事活动频繁,率先发动贸易战,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并单方面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无端挑衅中国。中国则是一再强调,无意主动破坏中美关系,仍致力于“管控中美分歧”,但对于美国的出格举动,中国一定会坚决反制。中国发展依然需要和平的环境,无意主动挑战美国,无意主动改变现状。然而,现实是美国对中国的抵触心理高涨,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倍增,和平面对的风险不断上扬。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一些政客以及西方个别所谓“人权保护组织”围绕新疆发起新一轮的抹黑行动,出于政治目的编造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谎言。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政府对新疆采取预防性反恐去极端化措施之前的20年间,新疆曾发生数千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经济损失无以计数。现在,新疆已有三年多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有些西方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们打着所谓人权和宗教的旗号,不断编织各种荒谬至极的谎言,目的是搞乱新疆、遏制中国。

西方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肆无忌惮、堂而皇之地恶意误读中国,除了前述提及的语言交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意识形态等原因外,还有几个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久远以来形成的偏见。从启蒙运动

后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的描摹和叙事就充满了某种特殊指向的价值否定意义,使一种固化的、物恋的、低劣的他者形象成为中国的象征。这个话语图式包括贬低中国论和“黄祸”威胁论,经过不断强化和渐进积累,已经固化为西方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自我想象框架。(2)现实主义前提下的利益考量。对美国而言,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是其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的迅速崛起已威胁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美国必然从多方面寻求对中国的“制衡”和“削弱”,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误读”只是这种利益争斗的话语表征。(3)媒介化描摹的推波助澜。在现代社会中,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媒介本身已经独立和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直以来,西方媒体按照其思想主导和模式规制的需要对中国进行议程设置,采取多种方式捏造和夸大中国的负面、非人道、不民主和威胁性形象,长期从民主、人权、台湾、宗教和腐败等几个敏感性议题妖魔化中国。长期处于这种人为规设的舆论格局中,中国话语的被恶意误读就会不断被强化(潘娜娜,2012)。

4 西方恶意“话语”误读的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我们认为要着力做好四个方面。首先,着力培养自己的“故事员”,进一步训练和加强我国各级官员的话语解释力和媒体公关能力,尤其是与国际媒体打交道的策略处理能力;同时,目光要向外,注重聘请外援,即在国际上建立由当地华人领袖组成的研究咨询机构,在制订国家公共外交政策和国际传播方略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请他们发出声音,向国际社会解读、传递中国的真实形象。其次,着力培养自己的“创作员”和“翻译员”,生产和翻译好中国故事文本,形成传播者与接受者共同的情感交流语境,加大中国好声音传播和讲好中国故事力度,做好中华文化外译工作,使得中国故事既能被国内受众接受,又符合对外传播规律和国外民众的审美期待,做到彼此分享、彼此欣赏。再次,着力提升自己的“话语方式”,要在跨文化传播中注意用国际社会易理解、能接受的方式、习惯与话语进行阐释和叙事,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使得中国故事的现代语境演绎与国际化表达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既定程序和规范路径(陈圣来,2016)。最后,着力加强国家硬实力建设,以对等的中国话语体系来审视和清理西方反向话语,也是消除这种恶意误读的对策与路径规划。此外,综合国力的强大可以为国家话语传播的效果增添砝码,使得国际社会在接受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影响之后,自然而然地接受中国话语权的合法与权威地位。

5 结语

面对外部语境对中国话语的误读,中国话语的传播者要努力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宏观政策的了解和认知,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确立跨文化传播的主体间性原则,重建和定位中国的文化价值,对中国的知识思想体系进行完整梳理和当代重构。唯有以多维度、多视角、多场域的宏观、中观、微观的理论回应与路径实践应对西方社会对中国话语的恶意误读,才能逐步消解西方的霸权话语范式,凸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包容性与平和性立场。

参考文献:

- Bloom, H. 1973.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M]. New York: Oxford UP.
- 陈圣来. 2016. 现代语境与国际表达中的中国文化考问[J]. 现代传播 (10): 12-17.
- 樊浩. 2001. 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冯寿农. 2001. 文本语言主题——寻找批评的途径[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
- 伽达默尔. 1994.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乐黛云, 勒比松. 1995. 独角兽与龙——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希光, 周庆安. 2000. 软力量与全球传播[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理查德·D. 刘易斯. 2002. 文化的冲突与共融[M]. 关世杰,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潘娜娜. 2012. 从多维视角解读西方对中国的误读[J]. 江汉论坛 (4): 73-76.

- 王寅. 2008.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力”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
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3):211-217,241.
- 吴莉苇. 2006. 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3-70.
- 谢华. 2006. 跨文化交流中误读的合理性与不可避免性[J]. 江西社会科学(1):186-189
- 张龙海. 2010. 哈罗德·布鲁姆论“误读”[J]. 当代外国文学(2):57-67.
- 周宁. 2002. “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89-97.

Reflections on the “Misreading” of Discours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ZHOU Yuan LIN Keqin

Abstract: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discourse” is an inevitable social phenomenon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t is also a special way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es. Among al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ays of thinking, behavior, and ideology have caused discourse “misreading”. The factor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goodwill, creative treason in the “misreading” of discourse need not be exaggerated, but malicious misreading deserves great attention. We should look at the existence and rationality of misunderstanding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fied symbiosis. Within the process of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al phenomena, we should try to find the correct response to the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of the kind “misreading” and the “malicious” misreading.

Key words: cultural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misreading”

责任编辑:蒋勇军

(上接第79页)

- 전영옥. 2002. 한국어 담화 표지의 특징 연구[J]. 화법연구(4): 113-145.
- 주시경. 1910. 국어문법[M]. 서울: 박문서관.
- 최현배. 1937. 우리말본[M]. 서울: 정음사.
- 武斌红. 1997. 朝鲜语接续词的设立问题[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6): 27-31.
- 郑慧,黄进财. 2019. 基于对译语料库的韩国语转折接续词转折强度分析[J]. 外国语文(2):99-107.

A Study of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Conjunctions in the Korean Language

ZHENG Hui HUANG Jincai

Abstract: Conjunctions in the Korean Language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contexts. They are characterized with complex semantic meanings as well as subtle differences. Due to the above facts, the study of conjunctions has been the long-time focus in linguistic circle and diversified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However, there are unsettled problems left, such as vague categorial classification and lack of syntax analysis. This paper centers its focus on conjunctions in the Korean language, sorts out the linguistic contexts that they are frequently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ur categories of continuants in the Korean language: continuative adverb theory, continuative word theory, conversational marker theory and substitution theory. Then, a new category continuants is proposed, together with the potential perspectives for the research concern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Key words: conjunctions; grammatical category; continuative adverb; conversational marker; substitution

责任编辑:蒋勇军